

明清文化家族生成机制析论

——以嘉兴为例

○李菁 李时人

摘要: 明清时期,嘉兴府以其突出的科举成就及文化家族数量在江南文化圈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文化家族的家学传承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家族化色彩。以文化地理学及家族学为主要视点,对嘉兴境内的文化家族进行梳理,从地理生态环境、经济生态、文化积淀、宗法观念与精神传承、对家族女性的培养与望族联姻、母教课子六个方面分析形成众多文化家族的原因,以展示明清时期嘉兴地域文学的特点及流传机制,并揭示家族对文化聚集的作用。

关键词: 嘉兴;文化家族;明清时期;文化地理学

作者简介: 李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嘉兴学院文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及地方文化。李时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上海20023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代分省人物志”(13&ZD116)。

中图分类号: I2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398(2017)03-0119-13

DOI:10.16067/j.cnki.35-1049/c.2017.03.010

家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其特定的地域性、族聚性及互动性而产生较大的研究价值。以家族文学作为参照系来整体观照文学的发展态势,可以显示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地域人文色彩。嘉兴地处环太湖流域的中心,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自古就为文化聚集勃兴之地,多望族世家。尤其是明清时期,延续百年以上的大家族比比皆是,其数量并不亚于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湖州几府,对周边的文化繁荣甚至对全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代学者潘光旦先生首先关注到了嘉兴望族的兴盛情况,并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对明清望族进行了细致的搜罗与统计,共整理出91支嘉兴望族“血缘网络图”,展现出嘉兴望族在明清历史中的显赫地位。然其也有不足,潘先生侧重于家谱式的编排,而对其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及生平事迹分析甚少,对家集文献及文学现象的解读也是空白。而后龚肇智先生又以十年时间写成《嘉兴明清望族疏证》,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家族血系进行了注释和增补,并以更加细致的考证展示了明清时期嘉兴望族纵横交错的家族世系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可谓贡献巨大。然而龚先生也仍未从文本解读的角度阐述嘉兴地域文学特征及追本溯源地探讨其内在因果关系。为补充研究的某种不足,本文试从地理生态、经济形态、文化生态、宗法观念与精神传承、望族联姻及母教课子的角度就明清时期嘉兴文化家族的形成机制作一个探讨。

收稿日期: 2017-03-10

一 环境优越: 负海控江, 交流便利

列宁曾指出: 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 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①

地理在形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经济水平、文化的区域特征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 其与文学生成的关系也曾被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钱穆等多位学者所关注。章太炎先生曾将治国学的方法归纳为: 辨真伪、通小学、明地理, 其中专辟一章陈述“明地理”的重要性, 他认为“地理包括地质、地文、地志三项, 须做专门的研究”。^② 文学的研究不仅要从时间轴线上展开, 更应以空间为广阔背景进行考查, 文学因广阔的地域差异而体现出多样性, 因而从地理环境入手把握文学的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理包括的范围很广, 主要有山川、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 也包括历史沿革、风俗民情、教育水准、民族交往、人口迁徙、方言特点等社会因素。地理对于形成人的外貌、体格、性情及一地的风俗均有重要影响, 进而影响到行文的风格。梁启超曾云: “长城饮马, 河梁携手, 北人之气概也; 江南草长, 洞庭始波, 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 北人为优; 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 南人为优。”^③

嘉兴府在明清时期文化的繁荣与发达,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理位置的先天优势。明代嘉兴府下辖嘉兴、秀水、嘉善、平湖、桐乡、崇德、海盐七县, 地处杭嘉湖平原的腹地地带, 北接苏州府, 南临杭州府, 辖境海陆兼备, 河湖交错。陆域中平原面积约占总面积的90%, 水域面积约占总面积的9%, 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1%。《(光绪)嘉兴府志》对其地貌有着形象的描述: “浙西杭州半山半水, 湖州亦然, 嘉兴水多山少, 实为泽国。然澉浦乍浦滨海皆山, 则知抉兴盘郁于东南之气, 固不任其坦然而无所蓄聚也。”^④ 地处平原, 使嘉兴得以大量种植水稻, 成为太湖流域及杭嘉湖地区粮食的主要产区; 境内广阔水域的生活环境为嘉兴提供了丰富的水产资源, 使之成为生活富足的“鱼米之乡”。

嘉兴地理的优越性还在于其良好的气候条件。嘉兴年平均气温15.7摄氏度, 多年平均降水1193.7毫米, 所属区域为北亚热带半湿润区, 属典型季风气候, 夏冬季风交替显著。气候条件适宜于农业耕作, 尤其适宜栽桑养蚕, 为茧丝绸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平原地貌及适宜的温度给当地人们带来了优良的种植条件, 五代吴越在浙江立国, 主要依靠杭嘉湖平原的粮食而生存。至唐代, 嘉兴已成为国家粮食的重要产区。唐代李翰《嘉兴屯田政绩》云: “浙西有三屯, 嘉禾为之大。乃以大理评事朱自勉主之。且扬州在九州之北, 最广; 全吴在扬州之域, 最大; 嘉禾在全吴之壤, 最腴。嘉禾一穰, 江淮为之康; 嘉禾一歉, 江淮为之俭。”^⑤

水乡泽国的地理环境也滋育了嘉兴的水乡文化, 水本为温柔流动灵性的象征, 在水乡成长的嘉兴居民, 傍水而居, 出入有船, 以水为生, 小桥、流水、人家的布局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居住环境。淡雅的居住环境本身就是一首写不完的诗, 一桥、一亭、一船、一楼均可入诗入画, 成为文人取之不尽的自然素材。水乡静谧的自然环境也影响了居民的体貌性情, 嘉兴居民受水的滋养, 女子情感细腻丰富, 心灵手巧, 善于织染; 男子温文尔雅, 书卷气息浓厚, 工诗善画者众。在温润安静环境中成长的嘉兴居民形成了相对内敛的性格, 也孕育了嘉兴文化家族工诗文、书画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3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459页。

② 章太炎《国学概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第11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国地理大势论》,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年, 第130页。

④ (清)许瑶光修, 吴仰贤纂《嘉兴府志》, 光绪四年鸳湖书院刊本, 卷一。

⑤ (元)单修, 徐硕纂《至元嘉禾志》, 清乾隆间抄本, 卷二十。

及经史的特点。与周边苏州府及杭州府的文化家族不同的是，嘉兴的文化家族主要以经学家族、诗文家族、书画家族为主，而苏杭的文化家族中除了上述家族类型外，还有诸多的戏剧家族，如吴江沈氏家族、杭州洪氏家族。这与苏杭二府在经济文化上的遥遥领先密切相关，在明清时期苏州府及杭州府已成为东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都会，城市繁华，对说唱文学样式的消费群体相对更多。因地理位置、自然风光、都市的繁华程度相对而言不及苏杭两府，嘉兴府则更显小家碧玉，虽也繁华但在城市经济发展、人口聚集方面仍无法超越苏杭两府。

但紧邻苏杭的优越地理位置却为众多文化名人交流提供了绝好的条件。明代以来，伴随着手工业及城市商业的繁荣兴盛，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市民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明中叶后在江南流域的城市中收藏、鉴古、坊刻、才女文化及消费开始流行起来。以藏书、坊刻、字画及古董鉴赏为契机的文化交流十分盛行，明清时期，嘉兴出现了项元汴、冯梦祯、朱彝尊、曹溶、曹尔堪、汪森、鲍廷博、查慎行等一批以藏书著称的文化家族。

在思想领域，王学左派的兴起有力冲击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变革。随后李贽、汤显祖、袁宏道、李梦阳等人对“情”的提倡，进一步冲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给思想领域带来一片生机。整个明清时期社会思潮活跃，文学流派更迭频繁，思想交锋不断，尤其在晚明鼎革之际，文人结社、书院讲学蔚然成风，江南尤其炽烈。嘉兴处于江南流域的核心位置，为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汇之地，其诗文结社风气甚浓。经笔者考证，明代嘉兴府的结社数量达到22个，其数量仅次于杭州府，澄社、方外社、十大郡社、洛如诗社等均为当时知名的民间社团组织。顺治十年（1653）在嘉兴南湖举行了“十郡大社”的集会，“萃十郡名士赋诗，连舟数百艘”，汇集了复社及下面分社社员数百人。明遗民作家金堡曾叙述结社的盛况为“人才奔凑，剪烛飞觞。方舟结缟，殆无虚日”。^①

频繁的文化交流与文人结社也促进了文化名人间的交游。晚明松江名士陈继儒、董其昌曾慕名多次来到嘉兴进行鉴古、题写字画、赋诗甚至在嘉兴坐馆授课。嘉兴文化名人项元汴、李日华、包拯芳、冯梦祯等更是常往来松江、苏州、杭州等地进行文学切磋。在郁郁文风的浸染下，地方文学流派也此起彼伏，嘉兴一地先后出现了“浙西诗派”“梅里诗派”“秀水诗派”“嘉禾七子”“柳洲词派”“梅里词派”等诸多文学流派，其中“浙西词派”在全国亦甚有影响。大批文人互相交流、切磋诗艺、频繁结社，有力地促进了嘉兴文化的繁荣，也为文化家族的生成及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文学养份。

二 经济富庶：物阜民丰，人才汇聚

地理上的天然优势为嘉兴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及物质保障，再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养育了嘉兴居民独特的民性和社会生活格局，进而为地域文化风格的铸造奠定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基础。

负海控江的地理位置为嘉兴的河陆及海陆交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境内广阔水域及平原的生活环境为嘉兴提供了丰富的物产资源，至唐代时，嘉兴已成为交通发达、物阜民丰之地。宋元时期，宋室的南渡使经济文化重心发生南移，同时行政区划的提升及大规模河道的整治都带动了嘉兴经济的发展及人才的聚集，此时嘉兴已成为杭嘉湖平原上的经济重镇。因在粮食上的高产，嘉兴成为粮食贡赋特重之地。明代邱浚曾言“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

^① 魏桥《浙江名镇志》，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204页。

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① 明清两代嘉兴为国家的纳贡大户。明洪武年间,嘉兴府所辖三县(不含海宁),田粮税额征米505967石,增加2.4倍,当时嘉兴府田地占全国总耕种面积的千分之五,而赋粮却占全国百分之三,占浙江全省的31.3%。清代时粮食的负担不亚于明朝。清同治年间,嘉兴各县赋米征额为427000石,占到全省的42%,征银额56万两,占浙江全省的23.5%。

此外,嘉兴还是桑蚕丝织业的重要产地,嘉兴因气候、地形、水文等特点十分适合种植桑叶,早在春秋时期嘉兴一地就已开始了种桑养蚕的农业活动。《(光绪)嘉兴府志》记曰“生民之利莫大于农桑,嘉兴吴时,野稻自生,是自古有年,农夫之庆也。宋时濮院为织绵地,是匹妇蚕之,五十也可衣帛也。民用充而国用乃足,吴稷以供白粮贡丝以实筐筐,民事固可缓乎。”^② 在宋时,北方先进种桑养蚕技术的带入,嘉兴的桑蚕业有了跨越式的发展,种桑养蚕在嘉兴已十分普遍,也成为农家主要的家庭副业。明代以后,随着政府采取恢复农业生产、鼓励种植桑麻的举措及伴随江南地区工商业市镇勃兴,嘉兴已成为当时江南蚕桑丝织业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丝织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丝织品贸易的进行,嘉兴王店、嘉善魏塘、桐乡濮院、乌青均为以丝织业为主的市镇,濮院最盛,其地“肆廛栉比,华夏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绵帛千计,远方大贾携囊群至,众庶熙攘于焉集”。^③ 农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嘉兴手工业的发展,明清时期嘉兴丝织业、造船、酿酒、制盐等行业无论是生产的规模、行业种类还是生产技术水平都处于全国各地前列。

明中期以后,各类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及手工业的开展也带动了嘉兴农村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兴盛,嘉兴府市镇数量急剧增加,由宋时6个镇增至30个镇。在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市镇总数为316个,其中嘉兴府就有41个。清代初期虽遭战争的破坏,经康熙乾隆三朝的励精图治,嘉兴府经济得到恢复,市镇的数量除县城外共有93个,市镇间交错相通,往来便利,嘉兴的工商业再一次得到快速的发展,并成为江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明蒋静《黄田港闸记》曾描绘商业繁荣之盛况“富商大贾长棹巨舶夷滨海,错鱼盐未市之属,辐湊成市,居民富饶,市邑繁盛。”^④

经济的快速快展也带来人口快速增长,宋时嘉兴人口共计122813户,明洪武年间共有327532户,至康熙年间已达到551460户。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使城市迅速繁华起来,嘉兴俨然已有大都市的气象。明《(弘治)嘉兴府志》记载“嘉兴巨海环其东南,具区浸其西北,左杭右苏,襟溪带湖,四望如砥。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被时人称为浙西大府、江东都会。”^⑤

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及丰富的物产,嘉兴成为富甲一方的宜居之所。富庶的经济为明清时期嘉兴文化家族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使文化家族成员免于饥辘奔波之苦并能长久地安心于科举业及艺文方面的创作。人口的聚集与增长则为知识人才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储备与保障。西晋末年众多北方士族的南渡、唐末农民大起义、宋室的南渡都带来大批的北方大族来江南定居,而嘉兴以优良的地理条件成为北方名门望族避难安居的第一站。从嘉兴望族的祖籍地看,许多家族为移民家族,如海盐的张、董、徐家族,嘉善的郁、曹、俞家族,嘉兴的岳、高、陈家族等。嘉兴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秀州(嘉兴府)人口增长17.4%,人口密度超过了20户/平

① (明) 邱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5页。

② (清) 许瑶光纂《嘉兴府志》,清光绪五年(1879)年刻本,卷三十二。

③ (清) 杨树本《濮院琐志》卷八,中国地方志集成第2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④ (清) 许瑶光纂《嘉兴府志》,卷三十四。

⑤ (明) 柳琰《嘉兴府志》,明弘治五年(1492)年刻本。

方公里，明显高于两浙路的平均密度。至清中叶，全府七邑在籍人口为 317 万，每平方公里近 900 人，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府。人口的聚集为文学家族的产生提供了基本前提，一定规模的家族人口关系到家族人才产生的潜在数量。北方大族南迁带来的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增长，更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及家族的管理制度，这些都为后期嘉兴本土文化家族的孕育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三 诗书传家：以学兴邦，文风鼎盛

“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创造的文化，不是地理环境单独决定的，而是环境因素与人文环境（社会、历史、心理）的复合创造物。”^① 在人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地理环境虽有较大的制约作用，但人类的社会实践与创造对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更强的决定性和选择性。

嘉兴优越的地理条件固然奠定了先天优良的生态基础并带来广泛的族聚性，但嘉兴的人文蔚兴在更大程度上还得益于长期的人才储存及文献传承。嘉兴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素称“文化之邦”“巍科摇篮”，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各方志统计，明代七县共产生进士 581 人，清代有进士 562 人。其中明代嘉兴有状元 3 人，约为全省状元人数的 15%；清代状元 6 人，占全省状元的 30%，明清两代巍科（状元、榜眼、探花、传胪）28 人。近代学者潘光旦评价为“嘉兴是人才的一个渊藪，其地位正和它在地理上的位置相似，即介乎苏杭两地之间。”^②

嘉兴文风的鼎盛由来已久，这与地方对教育的投入与重视有较大关系。“学校，政之本也。”^③ 人才的出现很大的程度上得力于学校之教育，嘉兴文化家族的聚集兴盛与当地对教育的重视有较大关系。嘉兴学风自宋以来就相当兴盛，地方官学、书院、社学等在担负教育嘉兴子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古代教育体系中，主要分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中府学、州学、县学、社学为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机构，属于官学性质，其职责主要为朝廷培养后备官员，与科举紧密相关。书院则是作为官学机构的一种有效补充，成为活跃思想、交流学术的讲学场所。

嘉兴学校教育机构的设置始于唐代，《（光绪）嘉兴府志》记载云“嘉兴的郡县设学，始于唐，嘉兴笃学亦盛于唐，陆宣公是也。”^④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嘉兴县天星湖前孔庙后置一学室，供当地学子攻读经术。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知州安德裕在孔庙右侧建立州学。宋庆元元年（1195），州学改为府学。后至元二年（1265），府学毁于战火。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参议李文华在孔庙后重建明伦堂。随后在学堂周边还建了乡贤祠、启圣祠。嘉兴县学自宋咸淳五年（1269），县令以西城旧驿舍为县学，此后八十年未有重建，直至元至正十一年（1351），县尹陈伯颜重修大成殿，又经明宣德二年（1427）的校舍扩建，至明嘉靖十四年（1535）县学的体制才得以完备。《（康熙）嘉兴府志》对嘉兴教育机构设置情况进行了概括：

禾学之设昉于开元，太平兴国之时，而唐宋人材自宣公而后，亦遂骎骎乎日盛矣。先师祀典向兴，丛祠并列，兹为归之。学校之篇，凡良吏之祀于土，及士大夫没而祀于乡者，亦附焉。若社学、书院所以广教，旧以类从者，兹亦如之。为述千年来建置废典之迹，俾释菜之士游息其间者，不忘所自，始志学校。^⑤

①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②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第1页。

③（清）吴永芳纂《嘉兴府志·学校》卷五（康熙），清1721年刻本，第1页。

④（清）许瑶光纂《嘉兴府志》卷八，清光绪五年（1879）年刻本，第1页。

⑤（清）吴永芳纂《嘉兴府志·学校》卷五（康熙），清1721年刻本，第1页。

明清时期,嘉兴的各级办学机构已十分完备,府学、县学均设有学官掌校。明清两代,嘉兴府学设教授1人,训导1人,县学设教谕1人,训导1人。地方政府对学校的建设也非常重视,校舍的改建修葺为经常之举。平湖县学为明宣德五年(1430)所建,后因战火原因被毁,明清两代先后重修学宫40余次。秀水县学亦在明宣德五年(1430)所建,建立后在原基础上又不断增加了明伦堂、大成殿、文昌阁、尊经阁等建筑,降至清代,也曾多次修葺。

塾学和书院则是嘉兴颇具地方特色和影响力的民间办学机构。塾分为私塾和义塾,常由地方望族或儒士兴办,为乡里的教育机构。望族的家族教育主要是通过由家族兴办的家塾和书院展开的。嘉兴一地的望族十分重视儿童的启蒙教育,在儿童五、六岁时即由家族安排接受早期教育,启迪心智,为日后的科举考试作准备。明清时期,嘉兴一些中产以上的家族都设有家塾。晚清桐乡士绅严辰在《设立桐乡青镇两处义学记》曾云“故承平时,家弦户诵。苟有中人产者,无不设塾延师,以望其子弟之名列胶庠,为宗族光宠。”^①教育的发达有赖于经济的支撑,望族之家有着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及教育上的先天优势,使他们能够长时间地维持科举业。有些地方望族结交甚广,他们为了子弟的成材还广延名师教习子弟,如松江名士陈继儒就曾先后受邀至嘉兴项元汴及包拯芳家中坐馆授课。^②明末时一些学者为显示民族气节而隐居乡里,充馆授课。桐乡张履祥,明亡时回桐乡杨园村教儿童读书识字,他还提倡农耕,带领学生在学馆的田地里耕种。

书院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教育机构,通常能够反映地方的学术思想与文化水平。明代嘉兴府建有仁文书院、宣公书院、闻湖书院、思贤书院、东湖书院、崇文书院、天心书院、介庵书院等17所书院。清代嘉兴府各县书院增至27所,其数量在浙西仅次于杭州,在浙东其数量也仅次于台州和宁波(见表一)。书院的大量设立对加强学术交流及人才储备起着很强的凝聚作用,吸引了黄宗羲等一大批名流学者来此云集讲学,极大地活跃了文化氛围,在很大程度上为明清嘉兴地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表一 明清嘉兴周边各府书院数量一览^③

州(府)别	明代书院(所)	清代书院(所)	总数(所)
杭州	20	35	55
嘉兴	17	27	44
湖州	12	9	21
宁波	10	35	45
台州	16	65	81

明清江南市镇繁荣,官学私学的发达,加之江南文化圈的濡染及互动,嘉兴具备了文化发展与储备的各项条件。“家家有诗书,户户重礼乐”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极大地滋养和激励着科举士子,使他们勤奋苦读以努力实现金榜题名的人生理想。不断涌现的科举精英为嘉兴的文坛储备了大量人才,这批精英士子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为嘉兴地方文献积累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嘉兴地方文献保存较为丰富,各县均有诗文总集存留,据《嘉兴府志》统计,嘉兴自明清以来共存有17种地方文献,其中《携李诗系》收录汉代自清初一郡之诗人4000多家,可谓地方文学作品的总集;后《续携李诗系》又收清初至嘉庆间一郡1900多诗家;另《携李文系》又

① (清)严辰《桐乡县志》卷四(光绪),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② 李菁《陈继儒嘉兴诗交游考》,《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③ 本表据丁辉、陈心蓉《嘉兴历代进士研究》及汪林茂《浙东与浙西:浙江学术的区域分布及特点》统计所得,本文在引用时,作了一些调整。

收录了汉代至清代嘉兴府七县先贤遗文，共得作者 1236 人，遗文 1906 篇。此外还有《盐邑志林》《乍川文献》《当湖文系》《梅里诗辑》《濮川诗钞》等汇集各乡镇的文献。嘉兴方志纂修也十分频繁，自宋代有志书修纂以来，嘉兴共修志 73 次（含已佚），其中府志纂修达 18 次之多，县志纂修达 55 次之多。志书的修纂十分耗时耗力，不仅需要一定经济的支撑，同时也需要地方文化名人的提倡与支持，频繁修志表明嘉兴一地重视文化资源的弘扬与保存，同时也展示了嘉兴人对本土山川风物及文化的热爱与自豪。

家集文献是保存家族文化记忆的一个有效载体，所收录的家族事迹及文学作品较为丰富，它记载着家族中祖先的历史、家族谱牒及文学创作与观念等，是了解研究家族文学及家族内部关系的一扇窗口。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列出 91 支嘉兴望族，其中大多为文学家族，为弘扬保存家学及文脉并与当时文坛交流衔接，这些文学家族十分注重家族文献的保存与流传，家族后人往往将家族先祖成员的作品及相关文献汇集成编，以家集的形式传于子孙，以光耀、激励后人。经本人考证目前已发现《李氏家集四十三卷》《合刻屠氏家藏二集十二卷》《平湖屈氏文拾》《石门吴氏家集》《秀水王氏家藏集十二种》《秀水董氏五世诗钞》《海盐张氏两世诗稿》《平湖张氏家集》《嘉兴三李合集》《秀水汪氏四家集》等 20 余种家集文献。家集的留存，反映了嘉兴文化家族注重家族文献的保存与传承，注重家族精神教育的一大特征。这些当地望族以诗书传家，耕读相伴，崇文厚德，以使家族的翰墨血脉得以延续。

四 家训教育：传承宗法，精神激励

中国的社会结构经过漫长的演变至今，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制度及遗存却长期保留下来。而社会的细胞“家族”就是其宗法制度的一个缩影，它既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也是文学生产、消费的基层单位。近代学者钱穆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①

世家大族之所以能持续长时间的显赫与辉煌，与他们注重宗法教育与精神传承有很大的关系，这包括在父母、兄弟、夫妻、舅姑之间树立孝、悌、贞、顺之观念，以维系家庭成员的和谐关系，保证家族社会秩序的正常进行。同时，家族中的先祖也往往将对子弟的要求以家训的形式写入家谱或家集，来训示激励后人。这些训言大多告诫子孙世守德业，提倡读书，勤俭持家，孝敬友爱，希冀后裔克振家声。此外，一个世家大族还通过一定的家族仪式以密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祠堂的出现即是一个重要标志。祠堂的建立具在多种功能，一方面它为家族子孙提供了婚、丧、寿、喜等仪式举行的场所，另一方面祠堂也是订立家族家规、商议族内重要事务的所在地。祠堂内往往设立匾额、楹联、碑记以及族规家训，以倡导孝悌、友爱、勤劳、俭朴等为主要精神旨归，以约束和激励子孙，同时在祠堂中祭祀共同的祖先也使家族成员之间保持了一种精神上的统一性，正如“文化对人产生一种规训，因而知识的传递也代表规训的延续。”^②

在嘉兴的一百余支世家大族中，有不少家族有着独特的家学特色及家风，如秀水董氏五世擅诗擅画；嘉兴三李名震诗坛，追步文坛朱彝尊；秀水项氏以书画及收藏鉴赏精于时等。这些艺文家族通过制定家训、家规、撰写碑文一系列激励机制使家族才艺风习得以保存及流传。屈疆在《平湖屈氏文拾·先考事略》中谈及“我屈氏世世读书敦行，乡里推为望族。自若仓公后，益

① 钱穆《中华文化史导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8页。

② 郑淮、徐胜阳《“规训化”教育：学校教育负功能的审视》，《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究心理学诸书,不言而躬行,累传勿替,愿汝曹毋坠家声,毋替家学。”^①先祖倡读书重孝德的家族训言跃然纸上,屈氏家族虽在科举上并不显赫,但其家族子弟屈大成、屈学洙、屈学海、屈世楸、屈世棠等均富有文才,有诸文存世,才德深受乡里敬重,被推为一邑望族。

秀水董氏在《秀水董氏五世诗钞》末尾题跋中也谈到家风的重要性:

秀水董氏,文献之家也,夙闻以诗书画闻于时者,五世矣……虽无名德重位,世世作书生门户。吾于董氏今亦云尔,栲日未若,予又何幸而得友询五,且因之而得友其兄东苏耶?东苏善诗又善画,询五乃善画,是皆能继志述事,各得父之一绝,而不坠家声者也,今之若是者几人耶?^②

平湖张氏《忠献公祠后记》中论及了家训教育的重要性“公遗语有云:人道所先,惟忠与孝。又云:幼被家训,粗知仪方。又云:忠则顺天,孝则生福。勤则业进,俭则心逸。又云:学以礼为本,礼以敬为先。子孙闻之,虽二十世以遥,有不奋然兴起者乎?”^③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张氏在世乱后重建家族精神的一面旗帜,提倡忠、孝、勤俭、以礼持家的训言为鼓励后世子孙发奋有为、振兴家族提供了可贵的精神食粮。嘉兴谭氏在《声扬公传》中云“嘉兴谭氏自浙东之山阴迁禾,累传至太仆公而其族始大,其后扫庵、筑岩、舟石、左羽颀颀海内,皆以文章气节名于世,禾中称望族者莫不曰谭氏。三数传后,稍稍中落,然皆克自树立,不坠家声。”并要求“子弟无论智愚,不可不教以读书。四书经史皆可,以闲其邪心,而兴其善念。”^④嘉兴竹林高氏也为嘉兴一支科甲连绵之文化家族,先后出现高道素、高承挺、高佑钹等文化名人,家族中存有《高氏家训》,其中就包括续书香、奖读书、图上进、励官箴、和兄弟、敦族谊、置公产、埋露骨、戒游幕、慎医术十条训言,要求子弟在耕作之际不忘诵读,其家训包含内容不仅为提倡读书,更有如何为人处世及品德方面的训戒。

纵观明清嘉兴望族的训言可以发现,训言不光针对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对女性成员也有家训。文化家族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一般在幼年时即接受传统的妇德教育,学习《闺范》《女诫》《女德》之类的训条,以约束她们的行为。明清时期,不少嘉兴文化家族十分重视女孩的培养教育,有些甚至训女如子。平湖张氏是个极重教育的艺文家族,张诚妻顾慈幼时即在父亲指授下熟读诗书,“响泉先生家法綦严,训女如子。夫人七岁受《毛诗》《女诫》诸书,能通大义。旁及汉魏六朝、三唐,靡不研其诗。”^⑤张诚女儿张凤亦少时读书,她“性贞静,不苟言笑,少就外傅,能读《尚书》《毛诗》《小戴礼》及《离骚》《列女传》《六朝人小赋》。长尤嗜诗。”^⑥再如秀水钱仪吉妻陈尔士,也堪称贤妻良母之典型。她为告诫家族中的女性专写了《妇职集序编》一册,在序中云“女生十年,尚谓之幼,任其嬉游,不闲训诲。而俗尚早昏,未及笄年,已为之嫁。安知无违之教哉!爰采集经、史,析其条目,曰,敬舅姑、事夫主、和娣姒、佐祭祀、待滕妾、教子女、御卑仆。”^⑦正是文化家族中严格的宗法教育,使得家族闺秀能秉承传统之妇德,不忘记宗法之遗训,恪守女德,相夫教子,以使家族优良遗风代代相传。

在诸多世家大族修纂的家谱或家集中,其先祖提得最多的一句即为“勿坠家声,勿失家学”。家规家训在家谱及家集中普遍可见,它成为一个家族的精神符号,警示激励子孙后代持续

① 屈疆《平湖屈氏文拾》,稿本。

② 董宗善《秀水董氏丛书稿》,稿本。

③ (清)张培英《张氏家乘》光绪五年刊本,卷八。

④ (清)谭之樾《谭氏家谱·家传》,清三十一年木活字本,卷五。

⑤ (清)潘衍桐《两浙轶闻续录》卷五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687册,1995年,第173页。

⑥ (清)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八,民国11年(1922)铅印本,第19页。

⑦ (清)陈尔士《听松楼遗稿》卷二,引自胡晓明《江南女性别集》第一编,黄山:黄山书社,2008年,第586页。

不断地进取，以诗礼传家，维护家族的传统、声誉及地位，而后世子孙也因祖先取得的荣誉地位而自豪，鞭策自己自律进取、克振家声。可以说，一个家族遗留训言的多少及深刻程度直接关系到家族的兴衰。

五 望族联姻：培养闺秀，延续文脉

明清时期，随着思想界复苏人性、张扬个性之思潮的兴起，创作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妇女受教育的人群也不断增长，女性创作、刊刻、出版日益丰富，江南才女文化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嘉兴地域文风浓厚，家族普遍藏有图书，这给家族女子接受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与客观条件。许多望族之家已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家族的女性成才，以便为日后的望族联姻及女儿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和母亲奠定基础。

经历代世族的聚集，在明清两代嘉兴一地出现了一百五十余支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大多注重家学，有的具有深厚的学术根柢，有些甚至延绵一二百年长盛不衰，成为嘉兴文坛的主导力量。在这些文学家族中，已经出现众多闺阁女性的身影。本人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沈季友《携李诗系》、胡基昌《续携李诗系》、阮元《两浙輶轩录》、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及闺秀女性诗文总集、选集、诗话作品的考证发现，明清两代嘉兴共产生765名女性作家，家族闺阁作家有374人之多，占到总数的48.6%。其中明代有闺阁作家22人，清代有闺阁作家352人。

检索家集文献可发现，多种家集中提及家族女性阅读创作的情况且不少家集中存留有家族女性的诗文别集。屈宗到在《平湖屈氏文拾·古月楼诗钞跋》中记载其妹梧清的创作情况“余妹梧清，幼而性慧，好事仙佛，及读书识字，先君子手选汉魏三唐诸名家诗，俾络绎成诵，及髫龄即工吟咏。”^①后梧清病逝，其夫将其文记录并汇编成册。秀水的王氏家族堪称典型的文学家族，其家族成员王霭、王璋、王玠、王元鉴、王澄等人均有文集存世，王澄妻吴宗宪是一位女诗人，工诗，好吟咏，家集文献《秀水王氏家藏集十二卷》未因性别而忽视其才华，将其《清闺遗稿》收录家集之中。将女性作品列入家集不仅有助于女性才华的展示，提升女性在家族中的价值与地位，更为家族女性文学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除女性个人创作外，家族女性诗人群也成为嘉兴典型的文学生态景观。在这些闺阁女作家中，又以家族群为代表特征，即在一个大家族中由因血缘关系而成长于本家族内的女性及因婚姻关系而进入家族内的女性共同组成闺秀群，她们之间构成了母女、姐妹、姑嫂、婆媳、妯娌的关系，这些家族女性因才华水平的相似及亲密的亲属关系而形成天然的纽带，她们有更多家庭唱和或彼此酬赠赋诗的机会，与有才华的丈夫进行文学切磋也有力地增进了她们的诗文创作水平，有些女性甚至在父亲或丈夫支持下刊刻有个人诗文集及对女性的文本进行搜集整理汇编，她们在文坛的活跃构成了典型的嘉兴家族女性作家群现象。据本人初步统计，明清两代，嘉兴孕育了秀水黄氏作家群、嘉兴钱氏作家群、平湖孙氏作家群、平湖张氏作家群、嘉善钱氏作家群、嘉善孙氏作家群、桐乡孔氏作家群、桐乡劳氏作家群、桐乡严氏作家群、桐乡汪氏作家群、海盐彭氏作家群、海盐朱氏作家群等十几支规模较大的文学家族群落。江南人文地理及家族文化培育了嘉兴才女优良的品性，她们幼染书香，知书达理，交际广泛，慧眼独存，多才多艺，更有江南女子的洁身自好和韧性，她们在家族教育方面颇多作为，同时也带动鼓舞男性成员不敢轻易懈怠而逊于女子，从而对家道振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① 屈疆《平湖屈氏文拾》，稿本。

女性地位的提高及作用的增强也体现在婚姻之中。在中国封建时代,婚姻常常讲究门当户对,望族更加重视婚姻的联结,婚姻甚至成为加强望族结盟的一种策略。通过伙伴式婚姻的缔结,不仅可以扩展、加强望族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保持望族优良的文化基因,此外伙伴式的婚姻相对而言也更为稳固和谐。“婚姻纽带的重要性,也成为众多望族家庭甘愿投资女儿教育的一大原因。调教很好的新娘是文化资本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形式。”^①在江南望族的文化圈里,门当户对的婚姻仍具有普遍意义。恩格斯研究王公贵族的婚姻行为有一经典论断“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是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和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②在世家大族中,必定有一群文化精英,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因此,在婚姻的选择上,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知诗书的女子,这一方面是基于夫妻琴瑟和鸣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也是为后代子女优良品性之继承考虑。

在嘉兴的百余支文化家族中,世家大族之间的婚姻缔结占有大半,如海盐张惟赤家族与秀水陈德元家族、海盐马维翰家族、海宁杨存理家族有过联姻。张惟赤,顺治十二年进士(1655)乙未年进士,所娶秀水陈氏,为秀水陈德元的孙女。^③其家族成员或工文章,或经营仕途,在当地甚有影响。后张惟赤之女适海盐马氏,张氏家族中张宗松娶海宁杨存理之女。秀水黄氏家族与海宁沈淳家族、嘉兴项氏家族、石门吕氏家族、崇德郭晴家族、乌程潘仲骞家族有过联姻,如黄洪宪子黄承昊娶海宁给事中沈淳之女沈纫兰。^④黄洪宪之孙黄卯锡妻项兰贞,为项氏家族中项德成之女,也是一位望族才女。秀水钱氏家族中也多与郡望联姻,钱纶光娶秀水陈尧勋之长女陈书为妻,陈书即钱陈群的母亲,工山水人物花卉,亦工诗,其父陈尧勋为太学生,以善行著于乡,诰赠中宪大夫;而后钱陈群之子钱汝丰娶上海的世家大族李宗袁之女李心蕙^⑤。望族之间的婚姻缔结不仅扩大了文化家族的交往圈,也补充更新了文学的血液,使文学的传承有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及更大的空间维度。

闺秀女子自幼就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熟读诗书,知书答礼。婚后她们能够与丈夫探讨诗歌、绘画、书法等,有着更多精神层面的交流。在生育子女后,她们以自己的禀赋,还能成为一个贤良的母亲,承担起教育子女的重任。正是具备自身良好的文化素养,家族女子的婚姻更有伉俪相得,琴瑟和谐的可能。翻阅《携李诗系》《两浙轺轩录》《清代闺阁诗人徵略》等文献可发现,家族女性中夫唱妇随的幸福婚姻常常可见。举人沈麟振室陆瞻云,自幼读书,于诗尤工,吟稿甚富。“适同里沈孝廉玉园,日以诗文相倡和,白头偕老。”^⑥嘉善陆观莲适布衣受丹生。“夫妇二人偕隐于震泽西村,有池尚存,草屋萧萧,烟火时绝。比舍闻欢笑声,则雨鬢诗成,山夫击节而歌,林鸟山鹤,一时惊起。”^⑦翰林院侍讲张金镛室钱蘅生,幼受庭训,读古唐诗数百首。归侍讲,乃以诗相唱和。侍讲尝绘《竹窗留月夜》,评诗意为图。夫妻两人感情甚为深厚,张金镛在京师为官时,钱蘅生则侍姑沈太夫人于家。道光二十六年,钱蘅生病逝,为悼念其妻,张金镛在文集《躬厚堂》集中专书《梦鸳词》一卷以记。钱蘅生又工绘事,张金镛尝绘《秋窗论画

①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②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四卷,2012年,第89页。

③ 陈德元,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进士,先后任礼部主事、员外郎中、山东按察使、广西巡抚等职。

④ 沈纫兰,字闲靓,工诗文,有《效颦集》。父沈淳,字仲丽,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癸丑进士,福建建宁府推官,选礼科给事中,累迁吏科。

⑤ 李心蕙,字云芝,上海人,工诗,嘉兴钱陈群子媳,女诗人归懋仪姨母,有《偶吟存草》。父李宗袁,字式凡,号柳溪,贡生,刑部主事,广西梧州知府,有惠政。

⑥ (清)胡基昌《续携李诗系》宣统三年刻本,卷三十八,第1页。

⑦ (清)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徵略》,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卷一,第23页。

图》以纪其事。嘉善沈粟为陈仲严室，沈粟诗词皆工，“归诸生陈仲严，绮窗联句，刻烛拈阕，称为一时佳话。”^① 桐乡张伧青，乌程诸生沈思美室。《桐乡县志》载“伧青素工吟咏，与夫少年伧伧，情好甚笃。尝于春暮并坐红窗，扫笺涂砚以唱酬为乐。”^② 平湖鲍诗，字令晖，适监生张云锦。鲍诗生于望族之家，“姊妹四人俱工书，而诗尤有声，香奁间画，亦点染有致。适张铁珊，伧伧相唱和，雅擅和鸣之乐云。”^③ 嘉兴李璠，字瑶圃，为贡生李日华女，张之梁室。《石澜山房诗话》载“瑶圃性敏慧，通习《孝经》、《毛诗》、《小戴记》、《列女传》诸书，尤酷嗜唐人诗。脱口辄谐声律，复秀丽有致。适同里张文石，治家有法，闺阁之内自相倡和。”^④ 还有海盐宫婉兰，进士伟鏐之女，与其夫冒襄“曲室唱酬，才情朗畅，伧伧之笃，亚于埧篴矣。”^⑤

才女闺秀嫁入诗书之家，对家族文学的累积和演进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文化家族的女子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她们可以带来更广泛的家族社会关系，使望族的声誉、文脉、财富得以延续。在这些文学家族中，往往有一二位居于核心地位的女性，她在家族中有举足轻重的身份地位，以其自身良好的文学素养在家族中起到教育子女及倡导族中子女读书赋诗学艺的作用。

六 注重母教：以身垂范，不遗余力

为使家族长期保持兴盛不衰，望族家庭十分重视子弟的学业，以使他们在科举上有所作为，从而延续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在明清嘉兴的文化世家中，家庭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而承担此项重任的多半为母亲。因此，督子课读以习举业便成为闺阁女性的一项重任。她们不仅用丰富的学识教习自己的子女，在为人处世方面，她们也亲自做出表率，以树立良好之家风。母教，成为望族闺秀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

嘉兴望族中不少女性以身垂范，教子学习，不遗余力。嘉兴钱仪吉室陈尔士，字炜卿，余杭人。“炜卿幼习经史，工吟咏。仪吉居京师，丁艰奉柩南归。炜卿独居邸第，肃庀家政，督子保惠读，不中程度，夜不得息。体素羸弱，积瘁成疾。歿前一时，犹令幼子读《易》床下，论说如平时。”^⑥ 桐乡孔传莲，县丞冯锦继室。生平工诗，善笺札。时“锦在宜川，以勘赈积劳，感时疫，误医成痼，归竟不治。氏维持调护至三十余年始卒。翁景夏官江苏粮道藩司，氏皆随侍。每遇大宾祭，辄命主中馈事。逮引疾归里，夫弟鈇供职铨曹，氏率孙浩左右侍养，朝夕承欢。歿后哀毁尽礼。课浩读书极严，每训之曰“汝父既病废，汝若不成人，吾复何望？且如祖父母之嫡系何？”故浩得发名成业，皆母教也。”^⑦ 桐乡沈廷光的妻子孔继瑛，字瑶圃，巡道沈启震之母。“瑶圃工书善画，夫远游，课子读书，而身率小婢终夜纺织。尝有句云‘窗下看儿谈《鲁论》，灯前教婢捡吴棉。’又‘夜枕先愁明日米，朝寒又典过冬衣。’皆当时实事也。”^⑧ 桐乡贡生施曾锡之妻金镜淑，施曾锡二十九时病亡，其子施福元才七岁，金镜淑独自抚养福元长大。虽然身处困境，但她并未放松对儿子的教育。《乌青镇志》载曰“课子极严，督作课文，每至夜分不休。福元后登贤书，应召试高等，入四库馆，氏皆及见，咸谓母教所成，且彰节孝之

① (清) 潘衍桐 《两浙輶轩续录》续修四库全书 168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五十四，1995 年，第 219 页。

② (清) 严辰纂 《桐乡县志》(光绪)，卷十八，中国地方志集成第 23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801 页。

③ (清) 胡基昌 《续携李诗系》，宣统三年刻本，卷三十七，第 35 页。

④ (清) 胡基昌 《续携李诗系》，第 27 页。

⑤ (清) 施淑仪 《清代闺阁诗人徵略》，第 7 页。

⑥ (清) 潘衍桐 《两浙輶轩续录》续修四库全书 1687 册，第 187 页。

⑦ (清) 施淑仪 《清代闺阁诗人徵略》，第 2 页。

⑧ (清) 施淑仪 《清代闺阁诗人徵略》，第 3 页。

报。”^① 嘉兴闺秀沈鑫,张湘任妻,张金镛、张炳堃母。“自幼明大义,兄弟姊妹间有疑事,皆赖以决。其训子有云:吾祖宗以浩气为人,吾儿读书入仕,正谊不谋利,吾之愿也。又尝言,仁为人心,须臾不可离。言重词复,皆合经旨。”^② 还有海盐陈书,号上元弟子,自号南楼老人。陈文斋长女,太学生钱纶光继妻,钱陈群、虞贡生钱峰、诸生钱界母。陈书能诗善画,其画尤为出色,她善画花鸟草虫,笔力老健,风神简古,当时深得乾隆皇帝的欣赏。她对其子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视的。《国朝画徵录》载“其课子严而有法,长陈群康熙辛丑进士,入翰林,今官通政、北直学政;次峰,廩生,早卒;次界,宝鸡县知县,亦善画草。卒年七十有七。”^③ 正是得到母亲很好的教育,她的三个儿子均得以成材,拥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这些才情女子以自己坚韧的毅力和自己丰富的学识不遗余力地教育子女,使得子女得以秉承家族的优良传统,勤学苦读,终成良材。在它们的诗文中,常可见其辛勤课子的诗句。海盐庠生杨玠妻钱氏,她在《夜课儿子读书》一诗中记录下自己课子的情形:

稿砧永诀已经年,窃拟长斋绣佛前。帘外雪飞声淅淅,檐端雨滴泪涓涓。

米珠薪桂忧何益,画荻丸熊志独坚。儿辈不知尘世事,摊书解诵蓼莪篇。^④

嘉善金兰贞,字幼芳,举人王丙丰妻,工诗善画,秀骨天成。她“年二十三归王家,贫,早寡。衰姑年七十。女史以针黹佐甘旨。又值寇难,流离困苦,侍奉维谨。抚孤成立,入邑庠。”^⑤ 在《自题寒窗课子图》一诗中她写尽教子读书的辛苦:

刀尺声中二十年,篝灯课子读遗编。一帘明月寒侵影,半夜邻鸡听未眠。

历尽冰雪惟汝望,况逢离乱有谁怜。展图顿触当时感,墨泪和来洒素笺。^⑥

这些女性将教子成材当成一项自己的事业,她们不仅亲自陪子女读书至深夜,有些还要操持家务捡棉纺织,颇为辛苦,但她们不畏艰辛,教子成材的愿望十分强烈,因为子女代表着家族的希望与未来,也是望族世家得以文化传承延续的根本。

结 语

综上所述,任何文化的产生及流变都与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息息相关。明清时期嘉兴文学家族的广泛形成并非偶然造就,它是经“家族”这一载体将文学资源整合后的喷发式增长,是长期文化的贮积与经济支撑及地理乡土濡染共同作用的结果,带有强烈的血缘、地缘、业缘特色。明清时期文化家族的形成壮大,为嘉兴地域文学演进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它以其特有的诗性品质、典型的家学特色、丰富的艺文色彩为江南流域的文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① 卢学溥续修《乌青镇志》,民国二十五年(1936)刻本,卷三十一,第79页。

② (清)潘衍桐《两浙翰轩续录》续修四库全书1687册,第201页。

③ (清)张庚《国朝画徵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3册卷下,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03页。

④ (清)胡昌基《续携李诗系》宣统三年刻本,卷三十七,第16页。

⑤ (清)潘衍桐《两浙翰轩续录》续修四库全书1687册,第189页。

⑥ (清)金兰贞《绣佛楼诗钞》,清光绪2年(1876)刻本。

About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ultural Cla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Jing , LI Shi-ren

Abstract: Jiaxing prefecture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it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and the numbers of the literary families in the Jiangnan cultural circl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se intensive literary famili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ion of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style and literary ecology. Taking cultural geography and family science as the main viewpoint, we analyzed the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of numerous literary families from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cultural heritage, patriarchal concept and spiritual inheritance, family marriage and mother education,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Jiax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ts circulation mechanism and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ies on the cultural accumulation.

Key words: Jiaxing; literary families;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cultural geography

【责任编辑 陈雷】

(上接第 111 页)

Research on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Brand Authenticity on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WANG Na , RAN Mao-gang , ZHOU Fei

Abstract: As the consumer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s rising, the consumers began to take the green value of the product into their consuming decision-making, and the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ough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umers' purchasing behavior and the brand authenticity, few people focus on how brand authenticity influences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in the field of green consumption.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nd authenticity and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through a survey of 144 domestic consumer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brand authenticity has a direct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brand trust, environmental self-accountability and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and the brand trust and environmental self-accountability both have a direc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Environmental self-accountability play a partially mediate role between brand authenticity and the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but the intermediary function of brand trust between brand authenticity and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is not supported.

Key words: brand authenticity; brand trust; environmental self-accountability;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责任编辑 吴应望】